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

王思治　　(香港)吕元骢

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岁在甲申。这是神州震荡的一年，也是明清鼎革交替之年。

明清变革之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清军入关和清朝的建立，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斗争激烈，其间充满着权术与机敏，朝秦暮楚与反水，风云变幻，历史进程波澜跌宕。值此清军入关三百五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申说浅见。

(一)清军入关和清朝的建立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激烈斗争的历史结局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历时一年有余的明清松、锦大战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结束。督师洪承畴被俘，宁锦镇将祖大寿投降，明军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已难于再与清军抗衡，同时也削弱了镇压农民军的力量。明朝国运已然日薄西山，皇冠落地已是指日可待。对明之将亡，清太宗皇太极了然于胸，其预见与分析十分精辟。他说：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遏止。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松山、锦州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路援军耳。今皆败之以尽，即有新募之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作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①

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②然而，他却未能如愿以偿，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暴逝。其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改明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

清军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野战，但部队数量有限，清统治者意识到，统治着全国广大地区的明朝，倘若集天下之兵力、物力与人力，毕注于东北一隅，以对付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则是颇为困难的。因此，曾构想联合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共同对明作战，并取中原。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在崇德年间率军破边墙入内地蹂躏京畿广大地区的作战过程中，曾奉命"问流贼消息。"③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清廷派使者取道蒙古致送书信一封给李自成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书云："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至诚至愿也。"④尽管清廷"至诚至愿"与大顺军联合作战夺取中原，但此时李自成已率大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风驰电击，势如摧枯拉朽，清廷的一厢情愿已无实现的可能。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八日，大顺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明军勤王之师不至，北京城陷入惶急之中，百官措手，相对而泣，无人能出一御敌善策。平日刚愎自用、威莅群臣的崇祯帝朱由检已是六神无主，惟有仰天长叹，绕殿环走，捶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当日晚，大顺军攻破外城，京城危如累卵，紫禁城内更是大乱。崇祯带领少数内官，欲从北齐(朝阳门)、安定门突出逃命，未果，与太监王承恩返回煤山(景山)，登临四望，但见火光烛天，声动天地，知大势已去，遂上吊自尽。十九日，大顺军攻占北京城。李自成由德胜门进城，率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至皇宫，仰射承天门扁，然后进宫。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俯首称臣，存在二百七十七年的明朝覆亡了。

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明朝覆亡。当时在沈阳的清廷尚未得到确报。但大顺农民军向北京的迅猛进军，大学士范文程已敏锐地觉察到形势将要发生突变。四月初四日，他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指出在大顺军的打击下，明亡在即。他说：“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文程认为，这就需要从战略、策略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此，他建议：第一，清军由“伐明”转而扫荡农民军，这就应收揽人心，尤其要招降明朝官吏以为己用，故应“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一反清军过去的烧杀掳掠，并“择其贤能，恤其无告”，使民有所依；对明官吏之投降者，则“官仍其职”，以资笼络。第二，清军主力应“直趋燕京”，据神京重地，然后中原可传檄而定。范文程还特别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此乃“上帝潜为启佐，此正欲摄政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⑤而明亡之消息旋至，清廷当即召开决策会议。范文程说：“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敦促清军立即入关。并再次上书多尔衮，分析了农民军攻占北京后，由于追赃助饷，出现了“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的局面，看到了官僚士绅对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因此，只要“恤其士夫，拯厥黎庶”，联合汉族官绅地主，以安百姓，声罪致讨，兵以义动，李自成“虽拥兵百万，横行无惮”，可一战而破，统一区夏⑥。遇事敏捷果断的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觉察到时间的紧迫，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⑦。四月初九日，(范文程第一次上书五天后)，他率领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部，向关内进发。

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将进入辽西。多尔衮以军事咨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建议的要点是：第一，“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安抚民人，有开门迎降者则官加升，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第二，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破边墙而入，精兵在前，辎重在后，计算里程，限以时日，疾行而前，出敌不意，直抵北京，在大顺军措手不及之时将其击溃；第三，洪承畴曾经是明军统帅，长期与农民军作战，深知农民军战斗力之强，他特别告诫多尔衮，从未与农民军接战的清军不能掉以轻心，“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也。”⑧多尔衮对洪承畴的意见十分重视，使他日后对大顺军作战时用心深谋。清军之所以取道蓟州、密云，而不走山海关，则是因为山海关有吴三桂扼守。

明清松锦战后，明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宁远，吴军约五万人，是明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劲旅，号称关宁铁骑。明廷不敢轻易调动这支军队，凭其阻扼清军入关。三月，大顺军迅速逼近北京，吴三桂奉命以一万人留守，率所部约四万人入关护卫京师，屯于滦县、昌黎一带。李自成攻占北京后，遣明居庸关降将唐通前往招抚，吴三桂归降，率所部进京朝见李自成，大张告示说：“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⑨所过地方百姓不必惊恐。旋有家人自北京来报，其父吴襄在京被大顺政权拘捕索饷，其爱妾陈圆圆又为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夺。吴三桂

本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其人反复无常，闻讯大怒一“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转旗而东，率部返回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所遣守关镇将唐通。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顺军主力进军山海关，并携带吴襄、明太子朱慈烺及定王等明宗室多人，准备再次招降吴三桂，如不从，即以武力消灭吴军。吴三桂处于大顺军与清军两大军事力量之间，以五万人之兵力自然无力同时与双方抗衡。而他所占领的山海关，外控辽沈，内护京师，被称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乃是至关紧要的军事形胜之地，故其背向不仅决定大顺军与清军孰胜孰败，而且也决定谁能取明代之。当此紧急关键时刻，吴三桂唯问一己身家之得失，不顾民族大义以求荣，决意向清军乞师。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军次翁后。吴三桂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至清营，致书多尔衮说，李自成“逆天犯阙”，崇祯帝不幸惨亡，自称“亡国孤臣”，激愤于忠义，特向清廷“泣血求助”，请多尔衮发兵。吴三桂自率所部“合兵”进讨“流寇”。多尔衮得书，虽未曾料及，不免心存疑虑，但其人多谋善断，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向山海关进发。同时，致书回复吴三桂，声称明清长期为敌，今当捐弃前嫌；对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故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旌，“期于灭贼，出民水火。”从此，多尔衮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了战略、策略的根本转变，从“伐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牢牢抓住“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这一旗号。并向吴三桂明白宣布，吴军与清军不是“合兵”，而是吴三桂投降一“伯若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而多尔衮本人则是“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⑩俨然是以全国最高主宰自居，由他来收拾山河。得到晋封为藩王的许诺，吴三桂向多尔衮投降。

四月二十日，清军至连山，大顺军已过永平。吴三桂再遣郭云龙至清营，敦促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关。⑪”多尔衮立即星夜兼程，于次日（二十一日）傍晚师至山海关外十里的欢喜岭。同日晨，大顺军早于清军抵达山海关，向吴军发起攻击。山海关东西有罗城，南北有翼城，拱卫关门及县城。吴军主力列于关之西罗城前的石河，面向关内，两军主力首先在此激战。李自成另遣一军攻击东罗城及北翼城，以包围吴军。两军昼夜恶战，距关十里的清军听到关上炮声深夜不止，但多尔衮按兵不动，蓄意不发，命全军披甲以待。在农民军的猛攻下，吴军已是不支，“北翼一军叛降贼”，向大顺军投降。二十日晨，形势紧迫。吴三桂冒着矢石驰往欢喜岭之威远台，向多尔衮俯首称臣，请求立即参战。鉴于吴三桂已然臣服，多尔衮说“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命清军分三路入关，豫王多铎率万骑由南水门入，英王阿济格由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由关之中门入。又命吴军以白布系肩，以免误杀。谕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等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⑫必待吴军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锐气损耗，才纵兵对阵奋击。大顺军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而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咫尺莫辨。吴军先与大顺军接战苦斗，风停后，清军数万骑同时出击，“大败贼众，追四十余里。”大顺军损失惨重。当日，晋吴三桂为平西王，令山海关军民俱剃发。

山海关的惨败，是大顺军的转折点，从发展的巅峰直泻而下，从此一蹶不振。二十三日，李自成退至永平，再败于吴三桂的追兵，于是仓惶撤退，二十六日还至北京，二十九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改元永昌。当晚纵火焚宫及九城门楼，撤往西安。

多尔衮命吴三桂追击大顺军，他本人率军则直趋燕京，所过京东各州县，无不开门迎降，谕令剃发。五月二日，多尔衮抵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多尔衮由朝阳门入城，明内监以明朝皇帝的法驾卤簿及御辇设于皇城外，跪迎道左，启奏多尔衮乘辇入宫，以皇帝之仪礼相迎，表明新主莅临。多尔衮命以摄政王之仪仗前列，卤簿法驾向宫门陈设，奏乐，举行入

宫之隆重典礼，向天行三跪九叩大礼，再北向沈阳（顺治帝福临尚在沈阳）行大礼，然后乘辇至武英殿升坐，接受明百官的朝拜，“城中大小官员及宦官七八千人”⑬匍伏在地，呼万岁。多尔衮宣布，清廷定鼎燕京。

1644年，明清变革之际风云变幻。在三月十七日至五月初二日的短暂时间里，京城皇宫三易其主，三易国号年号：由大明崇祯，而后大顺永昌，而后大清顺治。在神州大地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接连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或惨烈，或悲壮、或昂扬的活剧。历史演进过程是如此纷繁，说明了明亡清兴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激烈冲突的结果。明末，与顾炎武齐名的归庄曾北望神京，为“胡虏（清）纵横贼（农民军）更剧”而仰天长叹。辽事急，明廷调兵东向对付清军，农民军日炽，明廷又调兵而走以“剿贼”，东挡西战，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结果是，正如时人所说：“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⑭”被清太宗皇太极视为“大树”难于砍伐的明朝，是在东西两大政治军事力量不相与谋各自为战的夹击之下走向败亡的。明廷朝政败坏，官吏腐朽，党争不息，事事掣肘，决策之际每存门户之见，正如李自成在讨明檄文中所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⑮崇祯帝虽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史家谷应泰说：“怀宗之图治，与其所以致乱，揆之事实，盖亦各不相掩焉”。⑯崇祯帝求治而终于致乱，其举措乖张，使明朝国运日蹙，局势更不可收拾，结果是“（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一枉却十七年之精励哉！⑰”由于举措翻覆，力图中兴、廓清宇内的努力与苦苦挣扎皆成泡影。崇祯帝终于成为“图治”的亡国之君，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

（二）清决策者“既得中原、势当混一”与“退保山海关”之争

清军入关和清朝的建立，并非八旗军独力亡明，而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激烈角逐、相互影响的历史结局。激烈的武装冲突，则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利益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各种矛盾，是定鼎燕京后的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仍然面临的重大问题。

满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僻居东北一隅，社会发展远比中原汉族落后，明人称之为“东夷”。满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明为“南蛮”。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开始迅速发展，形成为蓬勃上升的民族。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历经其继承者太宗皇太极，明清之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如今终于入主中原，这在强调“夷夏之辨”的古代中国传统社会中，“夷狄”君临华夏，一些汉族士大夫认为，这是不同于易姓换代的“亡国”，而是神州陆沉“亡天下”的天地巨变，而天下兴亡“虽匹夫匹妇亦有责焉。”满洲贵族当权人物之中也不乏强调民族矛盾之人，有人竟然准备在燕京大开杀戒。另一社会矛盾，是如火如荼的明末农民战争，这是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战争。农民战争缘由地主阶级的压榨和官逼民反，李自成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讨明檄文中说：“朕（李自成）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切身痌瘝（痌，痛也；瘝，病也）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穷困，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垣冀，绥靖黔黎。”⑱他是为拯救黎民百姓，出农民于水火，奋起战斗，以“均田免赋”，“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相号召，在十多年的战争中，蹶而复振，终于

燎原。山海关战后，李自成率大顺军退出燕京，仍拥有数十万部众。张献忠领导的另一支大西农民军，据有四川，拥众数十万。同时，明在河南、江淮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损失，明军各镇有兵共数十万，明藩王宗室多人尚在。清、南明、大顺、大西四个政权，同时并存，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势必为生死存亡而继续鏖战，时人说："明亡，天下分裂。"⑲各种十分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满洲贵族高层当权者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英王阿济格对多尔衮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关)，可无后患。"⑳阿济格是多尔衮的胞兄，其人勇猛敢战，性情粗暴，不学无术，政治上鼠目寸光。多尔衮对其主张断然予以驳斥，他说："先皇帝(皇太极)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㉑"既得中原，势当混一，自此事无可疑。"㉒因此"不可弃而东还。"

清人初得北京，人心既不稳，形势又复严峻，为巩固京师，以图进取，多尔衮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使中央政权机关立即开始运转。入京之次日，谕曰：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有因避大顺军回籍隐居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用，"㉓同满官一体办事。(二)、传檄各州县，凡降者"地方文武官各升一级"，亲自携带有关钱粮册籍，兵马数目，来京朝见。㉔(三)、"入关之初，严禁杀掠。"自顺治元年始，除正税外，废除使民人深受其苦的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㉕(四)、派大将、降官招抚平定山西、山东，以护卫京师两翼。入山西可追击大顺农民军；入山东可窥视明在江淮以南的力量。(五)、"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倘若狐疑观望，定行问罪，发兵征讨㉖。(六)、从关外大量迁徙满人入关，举家搬迁者络绎于途，中原谓之"东人"，即东来之人。同时，令留守沈阳的清军来京，"将大举南向"，㉗为南进做准备。(七)、积极准备迎接顺治帝迁都北京。

上述各项至关紧要的措置，能否顺利推行，关系新建立的清朝能否在中原立足。除(六)、(七)两项外，关键在于收拾中原官吏军民之心，为此，多尔衮制定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标榜"仁义之师，期于灭贼"，"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庭之德。"㉘以转移满洲新贵族入主中原，广大汉族的"亡国"与"亡天下"之悲痛，从而淡化民族矛盾。

然而，剃发易服令却大违汉族人民之意，"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在京朝鲜人)而泣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㉙ 三河县民首先发难，起而反抗，各州县所谓"土贼"蜂起。剃发易服本是满洲贵族既定方针。满族以人数甚少统治广大汉族，自关外以来，就是以是否遵守剃发易服来区分"顺逆"。多尔衮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州县迎降，俱剃发，于是以为在军威震慑之下，无敢抗拒者，断然宣布此令。剃发易服令严重伤害了汉族的民族感情，违反了汉民族服饰文化传统，民族矛盾因而有激化之势。在南方明朝势力尚存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农民军仍然拥众数十万的严峻形势下，民族矛盾激化，新建立的清朝将会处境困难，而且与多尔衮淡化民族矛盾以图进取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多尔衮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作为权宜之计以待来日，立即下令停止剃发易服令，谕曰："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㉚这样，剃发易服令，从五月初三日发布，至二十四日，前后仅二十一天便暂时停止了，于是多尔衮锐意贯彻其基本方针。

（三）多尔衮宣称 清得天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也。“薄海同仇”？矛头引向农民军

明之亡，亡于李自成攻陷北京，而清军乘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故多尔衮堂而皇之地宣布：“国家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也。”㉛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明之官吏军民所应深仇大恨者乃是“闯贼”，他说：“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杀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㉜而李自成并未为害于清，清廷“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愤而“代为雪耻”，“实有救中国之计。”㉝如此“义举”，明之官吏军民理应对满洲新主感戴莫名，“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㉞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许官民哭临，以展舆情，“薄海同仇”，矛头指向农民军。

多尔衮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崇祯帝服丧的谕令下达后，“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㉟在北方，各地原明朝之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前大顺政权所派官吏守将，向清朝纳降。据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所制《山海关战役后三个月内官绅叛乱情况表》，各地杀大顺政权委派之官员守将者凡八十余州县，㊱其中不少地方“奉表（向清朝）投诚”。而汝宁、许州等州县，“愤张旗帜，直书‘杀贼报仇’四字，正与朝廷（清）仁义之师为先帝复仇之意遥相呼应。”而一些重要的官员之降清也是因此，如：

原明巡抚宋权曾投降李自成，任遵化巡抚，与总兵唐钰“率将吏绅士擒斩伪官，起应王师（清军）。”大顺守将黄锭、马应湖等被杀，尽歼守军，防御使、同知、县令被俘。㊲于五月初向清廷投降。宋权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这正是多尔衮所期望的。

原明大学士谢升，于顺治元年四月在其家乡德州杀大顺州牧吴徵文、防御使阎杰，“共诛闯贼所置伪官”，以待清军。六月，与在籍原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榷等，奉降表至京，向清投降，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虐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切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清）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尔，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㊳其对李自成与清廷之措词用语，与前述多尔衮之谕令如出一辙。

原明大学士冯铨，本系阉党，但熟悉明之典章制度。于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家乡涿州，与知州张锦、参将朱万祺等，杀大顺官员李都尉，“随将贼徒尽杀。”㊴闻多尔衮征召之命，即刻入京剃发投降。

谢升、冯铨与先降清之洪承畴，皆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恢复明内阁票拟制度，制定典章，对清廷草创之初，各种典章制度之制订，中央政权之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检索《贰臣传》，明之官员将军降清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效力于清朝，有政绩可述，有的官至大学士、尚书、封疆大吏，死后予谥。这对清朝统治之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招抚平定山西、山东，同样得力于多尔衮之策略方针。

顺治元年六月，降清的明应袭恭顺侯吴惟华，“请招抚宣大山西自效。”多尔衮允准，又派明降官王鳌永以户、工二部左侍郎身份前往招抚山东。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军平定山东一路，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一路，招抚与武力平定并举。

李自成计划退保西安，扼守山西以屏障陕西关中。六月初，明大同总兵姜瓖杀大顺守将

柯天相、节度使韩文铨降清，大同以南各州县受清招抚。榆次、太谷、定襄等地故明官绅乘机起兵杀大顺地方官。李自成派兵攻灭，但晋北已非其所有。自成率主力驻韩城，留降将陈永福守太原。在山东，不少地方也纷纷杀大顺地方官向清投降，霑化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斩大顺知县李调鼎，“赴招抚侍郎王鳌永纳款。”⑩德州、临清、东昌……等地，原明官绅也起而杀大顺地方官，清廷招抚平定山东进展顺利，六月底，“平定山东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启报，霸州、沧州、德州、临清，先后俱下。”㊶招抚侍郎王鳌永启报：“济南、东昌、青州、临清等州郡，以次抚定。”㊷七月初，巴哈纳、石廷柱奉命移师山西，李自成撤往西安，除太原外，山西为清所有。九月，太原被清军攻占。李自成扼守山西屏障陕西关中的作战计划随之失败。

由于各地明朝官绅纷纷杀大顺地方官降清，清廷招抚平定山西、山东，不逾月而底定，清统治者欢呼“河北、山东、山西郡县人民，悉闻风归降，接踵恐后。”㊸中原既为清所有，多尔衮积极准备迎接顺治帝由沈阳迁都燕京。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顺治帝福临自沈阳车驾西行，九月十九日抵京，自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日，举行“定鼎登基”大典，至南郊告祭天地，宣布清帝君临天下，“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仍用大清国顺治纪元，“俾我大清国皇图永固。”㊹中国历史上存在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

（四）清廷对南明策略之转变

多尔衮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把矛头引向农民军的策略，对南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自成陷京师，南都（南京）议立君久不决，时明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等宗室藩王避难江淮。诸王中以福王为明帝近支，他是明神宗万历帝之孙，但其人昏庸无能。福王至淮，阉党阮大铖向凤阳总督马士英言曰：“国有难，先立君者功高。”建议拥立昏庸之福王可把持朝政。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福王其人真可谓病毒俱全。马士英联络拥兵江北的黄得功、高杰等连营江北，移书南京，谓奉福王为主，胁迫诸大臣从命。顺治元年五月初三，迎福王监国于南京，十五日，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建立。以史可法、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等为东阁大学士，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驻镇淮安，负责山东一路招讨；兴平伯高杰驻泗州，负责开封、归德一路招讨；广昌伯刘良佐驻临淮关，负责陈、杞一路招讨；靖南侯黄得功驻庐州，负责光、固一路招讨。此所谓“江北四镇”。四镇共拥兵三十万，在其辖区内置官、刑戮、财赋“俱得便宜从事”，成为桀骜不驯的军阀。此外，驻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有兵约二十万，也是一个军阀。南明所控制的区域，远比清廷广大，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然而，弘光政权无意抗清，专注于所谓“西贼”。闻知李自成被清军和吴三桂军所败，无不欢欣，希望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后来抗清壮烈牺牲的史可法，在清军入关之初所期冀的正是“联虏西讨。”他说：“先帝（崇祯）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以纾宗社臣民之恨，是今日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之晋界而还，或云假之（清军）以破贼，或云借之以成功。……宁前既撤，则（清军）必随之以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名义，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也。”㊺

在“为我（明）复仇”、“先国仇之大”的认识指导之下，多尔衮为崇祯帝发丧，宣称“薄海同

仇”、“代为雪耻”，使南都大臣无不额首顶礼。马绍愉致吴三桂书云：“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㊻幻想联合清军西讨—“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㊼殊不知清廷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南明。

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坚定不移的方针，然而，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上同时在西、东南两方面与敌手作战，其兵力是不足的。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制订了如下的作战方针：“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㊽

这一作战布署，把攻击的锋芒首先指向农民军，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可以看作是多尔衮宣称的得天下于“流贼”的军事布署；第二，清军便于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东西两面同时作战，以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为了实现“次第定东南之局”的意图，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传檄河北、河南、江淮间故明勋旧大臣、文武官员及士民等，声称“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永怀继绝之恩，以敦睦邻之宜。”㊾将檄文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明白无误地承认已建立一个月的南明弘光政权的存在是合理的，只是要求南北“通和讲好”，这就使弘光政权抱有“存亡继绝”的幻想与清廷南北分治。于是派遣陈洪范为正使，左懋第、马绍愉副之，北上，以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一万疋，作为与清和谈礼，并许以岁币十万，“相约杀贼(农民军)”㊿，希望联合清军，“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首，以谢敷天之愤”51。

弘光政权一厢情愿“南北分治”合师进讨，而不明多尔衮之策略。正当南明使臣携弘光御书银币致谢通好，北上途中，清廷招抚山西侍郎王鳌永密报，弘光政权以“史可法为内阁”，督师江北，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据各镇，“请亟补镇臣移驻曹单，控扼淮徐。52”准备南进。顺治元年七月底，清军在山西、山东两路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京师形势日益巩固，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陡然转变，他致书史可法云：“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命弘光政权“削号归藩”、向清投降，若然，则南都诸大臣“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倘若不然，“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多尔衮)将简西行之锐，转旗东征，且拟释彼(李自成)重诛，命为前导。”“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安危在此一举。”53以武力相威胁，口气之凌厉，咄咄逼人。

八月十五日，南明使臣北渡黄河，左懋第已感到和议难成，建议弘光政权整顿兵马、严守备，“勿以臣北行和议必成，勿以和议成为足恃。”他认为能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守黄河，才能画江而安，保住江南半壁河山。54九月，北使至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大张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经过的地方，有司不必以礼相待，“着自备盘费。”55并只准许百人进京“朝见”。十月十二日，陈洪范等至北京，时已天晚，宿于鸿胪寺，关防甚严，不许举火，北使官丁饥寒苦甚。清廷收纳陈洪范等所带的礼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以及福王赏吴三桂的银一万两、缎二千疋，而待以藩臣朝见之礼，将福王的“御书”视为“进贡文书”。大学士刚林奉多尔衮之命严询南明使臣：“尔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56“突立皇帝，这是何说?”陈洪范等申说北使前来“通好致谢”，“相约杀贼”之意。刚林斥之曰：“崇祯帝死时，你们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却来多话！”宣称：“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出檄一通，当堂朗读，陈洪范等坐听。檄文历数弘光政权之罪；不援救崇祯罪一；擅立福王罪二；各镇拥兵虐民罪三。有此三罪，清廷“旦夕发兵征讨57。”陈洪范知清兵将南下，“以江左实情告

清而心卖(左)懋第。㊳"自请回江南策反南明诸将投降，并请扣留另外两名使臣左懋第、马绍愉。多尔衮依计而行，并通知时已率兵而南的多铎。

顺治元年十月十九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征讨大顺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经内蒙土默特、鄂尔多斯，由绥德攻击西安。二十五日，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讨南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率所部从征，渡黄河南下，密令"便道往征"大顺军。此乃"举大兵以攻晋豫"，先图李自成，"次第东南之局"的军事战略，故谕多铎、阿济格会师西安，"务期合力攻剿"。多铎平定李自成后，"移师南下"，征讨南明。㊴多铎出兵前一日，清廷传檄江南官吏军民，历数南明弘光政权三罪(即对陈洪范等当堂朗读者)，"惟此三罪，天人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同时，在山东济宁集中兵力数万，"便欲南征，又闻调取丽丹(朝鲜)数千，从海而南，"㊵大张征讨南明之声势，以迷惑李自成。

(五)，大顺军、大西军的失败

清廷大张征讨南明之声势，李自成因之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清军只英王阿济格一路由北来攻，而忽视由河南来的多铎一军，于是将大顺军不断调往陕北，"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㊶"李自成亲自"北趋延安逆战"，㊷ 与刘宗敏至洛川，闻多铎军至，潼关吃紧，于是赶往潼关。

十月中旬，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发起攻势，连克孟县、济源等城，清提督金玉和战死，怀庆告急。多铎大军至怀庆(河南沁阳)，大顺军撤退。清军由孟津渡河，直趋陕州(河南陕县)，于灵宝城外击败大顺军一部。十二月二十二日，多铎军次屏障关中的天险潼关二十里外，李自成率刘宗敏由洛川紧急驰援。二十九日，清军开始攻击，历时近半月的潼关大战，十分惨烈，其间农民军大将刘宗敏、刘芳亮先后出战，均为清军所败，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也失利。顺治二年正月十二日，清军攻占潼关。潼关失守，李自成固守西安的计划瓦解。此时，经陕北而下的英王阿济格所率清军，已进至米脂，形成南北夹击西安之势。李自成于十三日回到西安，当天率部撤出西安，取道兰田、商洛山区向河南湖广转进。在陕北的高一功、李过所部未能同行。十八日，多铎占领西安。

清军两路攻击西安，除潼关之战外，再无重大战斗。其时，李自成大顺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两支清军，而且在陕北有大将高一功等防守，陕北防线之溃败，清军一战而能占领西安，主要是投降大顺军的明官员将军叛降清军，如：南一魁，故明副将，降大顺军，"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逐自成至山西，一魁来降。王令前驱，西渡河，同明降将康镇邦招抚延绥东路，自黄甫川至安定边十七堡俱效顺，杀伪官(大顺)刘九德，随大军收西安。以功授宁夏总兵。"㊸董学礼，原明花马池副将，投降大顺军，李自成命为总兵，驻怀庆。多铎军至怀庆，学礼叛降，"并以书招宁夏伪(大顺)节度使陈之龙，贼将牛成虎获其书，尽杀学礼家属。会贼犯孟县，学礼渡河来援，杀贼千余。二年，随英亲王平陕西，署凤翔总兵。"㊹陈之龙，原明三边监军道，降李自成，任大顺军宁夏节度使。阿济格军入陕西，陈之龙诣军门请降，以节度使身份，"倡率(农民军)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㊺鲁国男，原明昌平副将，阿济格军至山西，降清，二年正月，同大同总兵姜瓖、于保德、宁武，击败大顺军大将高一功，"寻随征陕西，收复榆林、延安，陕西平。"㊻白广恩，原明总兵，骁勇敢战，曾随洪承畴参与明清松锦大战，多次

与清军为敌，又复与李自成大战于陕州、潼关，于固原投降李自成，“自成大喜，握手共饮，伪封桃源伯。”阿济格军至陕西，“广恩具疏投诚，自陈罪状。得旨：白广恩自告奋勇杀贼，具见苦心，不必自陈罪。”㊲总之，当清军入陕西后，投降大顺军的原明将领，“差不多全部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之下”，㊳他们之所以反水，正如陈之龙所说，是“借其（大顺军）兵权，以待天时”。㊴伺机反侧，向满洲新君俯首称臣，转而成为随清军镇压农民军的干将，所以清军迅速平定陕西，也如同招抚平定山西、山东一样，是多尔衮“薄海同仇”，号召故明官吏将军以“讨贼”为急务，淡化满洲贵族君临华夏出现的民族矛盾，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利。

清军占领西安后，清廷命阿济格追击李自成，“将流贼余孽务期剿除。”令多铎平定江南，恪遵前此“密谕，尔等往取南京。”㊵

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由河南内乡南下湖北，清军追及于河南邓州。阿济格奏报，李自成率领由西安撤退的马步兵十三万，汇合大顺军原来防御湖北襄阳、承天(锺祥)、荆州、德安(安陆)四府之兵，共二十万，与清军在河南邓州、武昌、富池口、九江及上述四州县先后接战八次，均被清军击败。其间武昌之战，大顺军损失甚大。武昌本是南明左良玉驻镇之地，李自成率军进抵湖北，击败左部马进忠、王允成。左良玉闻败，以“清君侧”为名，声称征讨马士英、阮大铖，率全师东下。李自成进驻武昌，清军随之而来，围以数重，刘宗敏、田见秀领兵出战，大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顺江而下，准备夺取南京，“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㊶清兵亦分水陆两路追蹑不舍，至富池口再败大顺军。而九江一战，清兵“穷追至贼老营”，大顺军指挥部被歼，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自成妻妾及两位叔父等多人被俘，又有投长江死者，刘宗敏被斩于军前。清军前后缴获大顺军大小船只三千余艘，骡马六千有余。南明左良玉至九江死于军中，其子左萝庚领其军，“泊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军十万，大小船只四万，向清军投降。阿济格奏报：“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计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矣。”㊷

大顺军在九江惨败，李自成率余部由江西掉头西转，进入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身边有卫士二十八名（一说十八名），突遭山民袭击。山民程九百者与李自成徒手搏斗，其甥以铲杀李自成，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遇害，时在顺治二年五月，此后，大顺军余部继续抗清。

顺治元年(1644年)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六月，攻占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张献忠即皇帝位，建国号曰“大西”，年号“大顺”。在李自成牺牲前后，清廷曾多次招降，张献忠不予置理。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清廷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会剿四川。同时发布谕旨招降，张献忠仍然置之不理。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征讨张献忠大西军，三月，清军抵西安。当时降清的李自成部将贺珍反清围汉中，大顺军余部二只虎（刘体纯）也由河南邓州攻入陕南商州，与孙守法守兴安，入川之道受阻。五月，豪格指挥所部由栈道向汉中、兴安疾进，败贺珍、二只虎，陕南平定，入川之路通畅，清军积极准备进兵四川。十一月，豪格率军入川，二十六日抵达南部县，张献忠部将大西军都督刘进忠降清，豪格获悉张献忠在西充。当年八月，张献忠焚成都，率部西北向，九月至顺庆府（南充），北上西充，所部数十万，列营凤凰山下。豪格命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八旗精锐）为前锋，由降将刘进忠引导，疾驰西充，豪格率大军“星夜兼程继进。”南部县至西充三百余里，鳌拜于次日（二十七日）黎明赶到。清军派出游骑侦探大西军虚实，大西军哨卒发觉后，“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闻报震怒，认为是谎报军情，欲将

报信之兵正法，经讨保开释。他仍然提审某逃官夫人。张献忠麻痹轻敌，闻警不疑，“殊不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矣。”俄而“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五人已到营前外对面高山矣。”这时张献忠始信为真。但又不问明情况，“随即骑马出营。”既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只同士卒七八名，一名太监，奔出营外去察明虚实。更未将清兵到来通告各营。张献忠至一小岗上，正在观察之际，叛将刘进忠认明果是献忠，指曰：“此即八大王也。”满兵即发箭射之。“突然一箭飞奔，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明末农民战争的又一杰出领袖壮烈牺牲。随行太监奔回大营，高呼“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大西军未战先丧主帅，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⑬

清军八旗长于骑射。朝鲜孝宗李淏说：“予曾见虏人(清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强劲，而必使其中最亲信者侦探敌情，斥候观变。其所以战胜攻取，皆出于此。”⑭张献忠突然遇害，证明确实如此。鳌拜等乘大西军大乱之际，纵伏兵奋击。豪格至，分兵四出，攻破大西军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缴获骡马一万二千余匹。⑮“而满兵死伤亦众。”⑯护军统领哈宁噶被围，几乎被歼。清军乘胜追击，攻占荣昌、隆昌、富顺、资阳等处。此后大西军余部在李定国等领导下，继续抗清。

(六)“彼(清)之失人心，专在剃发变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清廷迅速统一南方之计划受挫

朝鲜李朝显宗李棩君臣曾议论过明亡清兴的原因。朝鲜出使清廷的郑维诚说：“得见彼中(清)通报，则发政施令，皆是恤民之举，人民少无思汉(明)之心。人心之向背可叹如此。”⑰弘光政权遣使与清议和，北上途中，有士人曹逊、金镳、孙正强往见左懋第，言报国之志。懋第感慨而言曰：“渡江以来，仅见汝等，……尔辈正不可多得。”⑱大河以北之人不向往南明，固然有清之压力，然而，千里之行却只有“仅见”，“不可多得者数人”，亦可窥见其中人心向背之消息。这种情况，在弘光政权覆亡，清廷再颁剃发令，形势为之巨变，出现了社会各阶层掀起的抗清高潮。

顺治二年正月，多铎攻占西安后，二月旋师河南，奉命“即于三月初五率师南征。”⑲其时，在河南的大顺军平南伯刘忠降清，而河南大部份尚非清所有，为巩固后方，以利南征，多铎于三月间分兵攻略南阳、开封等地，自率清军攻取归德，“州县望风纳款。”多铎置官属，抚兵民，奏请速铸给印信，以防诈伪。得旨褒奖：“王方收关陕，旋定中原，勋庸茂营，朕甚嘉悦。”⑳河南局势初定，四月初五日，清军进抵距泗州(安徽泗县)二十里列营，多铎派兵夺取淮河桥。南明守泗州总兵闻风丧胆，已焚桥遁走，清军遂于当日晚抢渡，追击逃敌。淮泗失守，江北重镇扬州失去屏障，清军长驱直入，四天后，即四月十七日，由南明降将河南镇总兵“许定国导北兵至扬州”。㉑“初，公(史可法)以扬州危急，以血书寸纸，请兵部代题请救，不报。檄防河诸兵赴援，亦皆不应。”㉒督师史可法只得亲自登陴与诸将分守各门。十八日，清军围城而不攻，多铎多次以书招降史可法，可法焚其书，誓死不降。二十五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城，扬州城陷落，可法不屈死。清军屠城，“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㉓死者山积。

南明弘光政权内部腐朽，皇帝昏庸腐败，马士英、阮大铖揽权，江北四镇跋扈不臣，不听节制，清军已至淮泗，犹互相火并。左良玉兵指南京。马士英撤北防之兵，以堵御左兵，公然

曰："宁亡于敌(清)，不亡于左。⑭审定"从贼诸臣逆案"，直到南京陷落前夕，还有人上疏争论没完。⑮

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陈兵北岸。南明镇海伯郑鸿逵率水师守瓜州。两军相峙三日，八日晚，多铎命拜尹图、图赖、阿山等，率舟师于距瓜洲十五里处的运河偷渡长江。九日黎明，清军大队过江，郑鸿逵率舟师入海走福建。镇江为清军所占。十日，福王与马士英等出逃。十五日，清军至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率公、侯、大学士及众官跪迎多铎入城。官员将军降者二百余人，马步兵降者共二十三万八千有奇。十六日，多铎受百官朝贺，"递职名列营参谒如蚁。"百姓家设香案，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万岁，又书"顺民"二字粘于门。⑯二十五，南明降将刘良佐于芜湖俘获福王，押回南京，献俘于多铎。后来，"他被送到北京，在城墙上当众被人用弓弦勒死。"⑰多铎令博格、拜尹图、阿山等率军直趋杭州，明潞王朱常淓出降。

多铎入南京，发布告示二通，一为《大清摄政叔父王晓谕江南文武官民》，一为《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晓谕南京官民》。有云"奉天伐罪，救民水火。"若"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扬州)可鉴。"⑱一方面以屠城威逼敢于抗拒者，一方面又为收揽人心，多铎前往谒明太祖朱元璋陵，行四拜礼，并命修葺陵寝；又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南明左都御史李乔独先剃发易服以媚新主，多铎痛斥其为无耻，为此发布告示张贴南京四门云："剃发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⑲于是，有人说："豫王入南都有六事可取；一不杀百姓，二斩抢物兵八人，三骂李乔先剃头，四放妇女万人，五建史可法祠，六修太祖陵。"⑳因之，当多铎出南门前往报恩寺行香时，百姓"观者如堵"，而"清兵所过州县从风而靡，长吏罕有殉城者。"㉑江南各州县纷纷投降，即使后来抗清激烈的江阴、昆山、苏州等，也无不投降。多铎委署江南各级官员凡三百七十三名。

南明福王被俘、潞王迎降，多尔衮以为江南大定，而李自成亦已牺牲。仅仅一年之内，可与清为敌问鼎者先后败亡。在多尔衮的心目中，从此无敢抗命者，于是再颁剃发易服令，严厉推行，以为如此便能使全国军民臣服于清。然而，事与愿违，江南形势因此而突变。

顺治二年六月初，擒获福王捷音至京。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亦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㉒

剃发易服作为新朝制度不容非议，"若有复为此事，渎进奏章"者，同样是"杀无赦"。多尔衮又命大学士"传旨令官民尽皆剃发。"㉓于是剃发易服作为"顺逆"的标志严厉推行，各州县奉到限期剃发的火票后，不敢怠慢，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㉔江南士民大愤，已降州县纷纷杀清所委派官吏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荼的抗清高潮。

苏州，顺治二年六月初四，清军至，"士民各书'顺民'二字于门，争持羊酒迎候。追剃发令下，时有福山副总兵鲁之屿者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诸生陆世钥聚千余屯陈湖中。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义军攻入城中，焚官署，杀官员。抗清失败后，清将土国宝由盘门屠至欲马桥。

嘉兴，六月初九日，清兵至，知府钟鼎臣以城降，"居民争粘'顺民'二字于门。"清委署官吏谓之"南选"，"市肆安堵。"闰六月初六日，剃发令下，百姓哄至府署，镇将曰："徂剃发汝等

妻子俱不保。"民怨沸腾，数日间聚众三万余，将清所委知县"磔死球场。"抗清失败后，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幸免于难者仅三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弥天。"⑯

松江，清兵至，"百姓已归顺"。剃发令下，乡官沈犹龙"倡义守城"，招募乡兵、市井之人拒敌。抗清失败，"杀戮最惨"，" 至是果罹屠城之祸。"⑰

著名的"江阴抗战"("江阴城守")，也是先降后因剃发令起兵。六月二十日，清知县方享莅任，令各属造册献于南京，"已归顺矣"。市民说"今江阴已顺，想无事矣。"不久，剃发令下，令中有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众哗然，于是起乡兵，应者万计，以手巾系县令之颈拽之而杀。推阎应元为城主。清兵久攻不下；死伤者众，以致攻城时"无不流涕"。降将刘良佐百般劝降，谓"南北两直，山、陕、河南、山东等处俱已剃发，惟江阴一处违抗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城中公议答书云："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谓随众降清)，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守城三月，至八月二十一日城破，犹奋力巷战，杀死敌兵甚众。清兵屠城三日，"晨出杀人，暮则归营"，封刀后，一井中捞尸二百，仅观音一寺僧死者百余人，安利桥下河长三十余丈，"尸积与桥齐"。⑱

此外，有"嘉定三屠"，无锡、宜兴、常熟、吴江、崇明、嘉兴、湖州等，亦遭部分屠城。

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形成的传统，是族别的标志之一。时人有诗云："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华夏变为"夷狄"，"礼仪之邦"沦丧，被看作是自身民族存亡的危机，故江阴抗战者说："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之旧"，可以投降，而剃发则关乎"礼乐之邦"之存亡，因此誓死不从，坚持不二。而清廷之所以用剃发易服与否以定"顺逆"，就在于从民族心理上强迫屈服汉族之心，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然而，"彼之失人心，专在于剃发变服。"⑲人们为维护自己民族的传统，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位目击当时壮烈情景的外国传教士说："当他们(清)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100)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广大人民投身其中，虽"客贾僧道，咸来助战"，形成为汉族各阶层的共同行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七)、农民军余部由"降清"转而抗清也是因"剃发令"

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清斗争形成为广泛的社会力量，是根植于历史长期培育起来的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因此，反抗民族压迫的剃发令，是有其爱国主义的内涵的。

多尔衮本来以为，弘光政权覆亡，南方各省可以传檄而定。他说："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当即遣人带诏招抚。"清廷决策者认为，有皇帝的诏旨前往各省招抚，"百姓既有所属，草窃无不立解。"(101)各地将望风归顺，清军将再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抗清斗争的高涨，民族矛盾的激化，使清廷迅速统一南中国的计划严重受挫。顺治元年五月清军入燕京，二年五月下南京、杭州，仅一年而北方及华东为清所有，然而，统一南方、尤其是西南，却长达十七年，直到康熙元年(1622 年)南明永历帝被俘死于昆明，才统一中国大陆。江南太湖的抗清斗争是在康熙初，大顺军余部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清直到康熙三年(1664 年)，才最后失败。郑

成功抗清东南海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台湾郑克塽才投降。

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军十五年，之所以能坚持如此长久，是由于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大顺军余部是在先降清而后转为联明抗清，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剃发令。

福王被俘，闰六月二十七，郑鸿达、黄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元年(顺治二年)。同日，张国维、朱大典、方国安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隆武帝与鲁王两不相容。是年二月底，武昌左良玉以“清君侧”东下时，明巡抚湖广的何腾蛟被裹挟同行，后间道入湖南。隆武帝授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湖南。何腾蛟荐堵胤锡任湖广巡抚。五月，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群龙无首，士气低沉，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刘芳亮、田见秀、吴汝义、党守素、蔺养成，张鼐等，各率所部驻军于荆襄、湘北一带。李自成从西安撤退时，驻守陕北榆林一线的大顺军大将高一功、李过，未能随李自成撤退。清军攻占西安，高一功、李过取道四川沿长江达到荆襄地区。九月，郝摇旗等率军进至湖南湘阳、浏阳一线。何腾蛟遣长沙知府周二南等出城阻击，农民军大败官军，“杀伤无算”，周二南阵亡。(102)何腾蛟准备死守长沙，然农民军并未乘胜攻击。

在农民军与何腾蛟于九月间战斗的前后，大顺军各主要将领都与清总督八省军门、统属文武的佟养和进行谈判，有受招抚之意。八月二十二日，田见秀在其“投清”的禀文中说：“具禀田见秀，倾耳天恩，仁威远布，向化之心已非一日。今见王(王允成)、马(马进忠)二镇蒙谕招抚各营，秀敢不谨遵。”(103)八月十七日，郝摇旗的禀文称：“前承札谕，敢不如命，即差官修侯，并讨地方。”表示“倘立寸功，稍酬尊台之德。”(104)于是有九月与何腾蛟之战。吴汝义云：“具禀吴汝义，伏承仁德，遐迩具(俱)瞻。率土归服，咸往争先。切念汝义叨沐覆帱天，敢不倾心。近见王、马二镇遍宣圣意，各营乐从。”(105)据佟养和奏报，自顺治二年闫六月至七月，光山伯刘体纯、泽侯田见秀、总兵郝摇旗等各部先后差官到佟养和处“投顺”，向清政府报明所部马步兵人数，清政府分别给予官职札付，赏蟒衣银两。佟养和共招抚农民军“侯四员、伯二员、总兵二员、副将三员、官兵二十二万四千另五十名。”(106)佟养和将田见秀等分别安置于荆州和长江以南，但大顺军“各侯伯为剃头迟回观望。”(107)农民军各部提出的条件是：不剃发、部队不改编、给地安插。其时，与李自成誓同生死、被清廷称为“闯孽”的一只虎李锦(李过，自成之侄)与高一功所部“态度迥异”，佟养和多次遣人招抚，均遭拒绝。梅勒章京屯代六次派人前往，“人信不还。”(108)时李过、高一功部驻荆州、当阳间。十一月，李过在“伊母(自成妻高氏)再三劝谕下”，也“投札到省，似有归顺之意。”(109)李过提出的条件仍然是：“不肯剃发”，由其所部，“指取湖南”，“并请旨封爵。”(111)至此，大顺军各部均已与清方接洽，准备“归顺”。

大顺军各部与清官方谈判前后半年有余，由于清方坚持民族压迫的剃发令，谈判终于破裂。梅勒章京屯代谕李过曰：“我朝新制，为臣子能遵奉顺从，方见归顺之诚。”(112)李过等断然不肯剃发，而清方则寸步不让。佟养和谕令：“如(刘)体纯真诚投顺，我清朝制度以剃头为一统，倘不然，而不剃，是溷(溷，乱也)之也。“若能剃头，当即允抚。”(113)大顺军杀清方来使，“不遵剃发，咫尺判为二民”、“语殊无状，不堪上闻。”(114)举兵抗清。清镇守湖广荆州府总兵官郑四维，巡抚何鸣銮奏报说：“一只虎(李过)复叛于荆(荆州)、承(承天)”、“以不剃发为名，号召叛党，聚众亡命。”(115)李过等拥众数十万，因剃发令缘故，终于由有降清之意转而联合南明何腾蛟、堵胤锡，“冲突荆、襄、辰、常之间，兵力甚盛。”清总督佟养和战败，以致“督臣佟养和、抚臣何鸣銮，殚心竭力，无不顾此失彼之虞，日望大兵如饥渴。”又一次掀起抗

清高潮，而清廷“招服八省官民”的原订计划也随之大坏。

高一功、李过率部与堵胤锡联合，所部大顺军改称“忠贞营”。隆武帝赐高一功名高必正，封伯爵；赐李过名李赤心，封侯爵。郝摇旗与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等与何腾蛟联合，拥兵十余万，“雄据湖南。”隆武赐郝摇旗名郝永忠。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难。明桂藩永明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改元永历。农民军各部奉永历为正朔。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奇能等领导下，向滇、黔转移，翌年攻占昆明，以云南、贵州为基地抗清。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李定国，孙可望等与南明永历政权达成协议，“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116)会同诸将“共伸扶明抗清之约”。(117)从此，清军在湖广及西南遇到了以农民军为主力的坚决抵抗，其间经历了多次血战，清军损失惨重，数月间曾两蹶名王，皆死于大西军名将李定国之手。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72年）宝庆战役，清军死伤被俘五千余人，其中总兵以下官员三十余人。李定国乘胜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焚死。十一月，清廷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三贝勒、八固山额真（都统），共十五万精锐入湖南。李定国列营衡州蒸水迎敌。十一月二十九日，两军接战，自下午鏖战至次日黎明，凡数十合，阵杀清军数千，尼堪战死。定国军亦有颇大伤亡。尼堪素以骁勇敢战著称，临敌时，冠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以绣有两龙相交大旗为先导，率铁骑冲锋陷阵，被大西军斩于阵。(118)

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清军兵临缅甸，两年多（顺治十六年初，永历十三年）以前退入缅甸的永历帝，被缅人俘献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八日被缢于昆明蓖子坡。在勐腊的李定国闻讯，仰天大恸，旋卒。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覆亡。

西南抗清失败，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在夔东坚持抗清。刘体纯坚拒剃发联明抗清，先后转战于荆襄、湖南、黔东、四川酉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进入夔东地区，活动于川鄂交界的长江两岸山区。李来亨是李过养子。李过、高一功死后，忠贞营由李来亨率领。刘体纯开创夔东抗清基地后，李来亨、袁宗第、郝摇旗、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等先后到来，与汉中撤来的贺珍、以及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等，各率所部据险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康熙元年起，清廷调集四川、湖广、陕西数万兵力分路进剿，又调京师八旗劲旅参战，至康熙二年底（1663年），刘体纯兵败自杀，郝摇旗、袁宗第被俘牺牲，各部先后失败，只有李来亨孤军坚守茅麓山区。清军以二十万兵力分三路包围，李来亨率部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悬殊未能打破包围。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初五日，李来亨下令焚毁山寨，自杀。大顺军坚持抗清二十年终于失败。

李来亨壮烈抗清使满洲贵族胆落。嘉庆时礼亲王昭梿说：“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119)

最后一个提出“不剃发”作为投降条件之一的是在台湾抗清的郑氏，这已是康熙二十年以后的事。历史表明，清廷厉行民族压迫的剃发令，大大延缓了统一全国的过程。

以上概述了清军入关和清统一的历史过程。综而论之，明清松锦决战后，清军未及时入关，非不愿也。实因力量不足，故曾一度希望与大顺农民军联合亡明。甲申之变，李自成进京，明朝覆亡。明之亡固然是大顺军的辉煌胜利，更重要的是明朝的腐朽导致“中夏鱼溃”，所谓“天不祚明，不在于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珰党煽虐之际。”于是清军乘之。吴三桂始降李自成以后又叛降清军，是李自成入京后旋即撤退的根本原因。因此，清军入关

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激烈冲突的结果。

明亡，天下分裂。定鼎燕京的清朝，与大顺、大西、南明四个政权同时并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清决策者之间因之有进而统一全国与退保沈阳、山海关之争。多尔衮决意进取，统一全国，但就入关之初清所占据的地区大小、人力、物力、财力而言，均不如南明弘光政权，而南明、大顺、大西各拥兵数十万，清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但清军终于能先后各个击败对手，是由于多尔衮标榜“仁义之师”，“有救中国之心”，又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薄海同仇”，把矛头引向农民军，于是明之官吏、将军大批降清，已降李自成者也纷纷反水，华北很快平定，也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大西军之失败则是因张献忠麻痹轻敌。一战而溃，是役也使人看到清军训练有素，侦探奔袭，长于野战的强大战斗力。在这一时期，南明弘光政权也因“先国仇之大”，幻想联合清军西讨农民军，堕入清廷次第消灭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谋略之中。多铎下江南，弘光政权覆灭，各城纷纷投降。自顺治元年五月至二年五月，清军统一全国进展顺利，既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谋略的胜利。

形势的逆转是在顺治二年六月以后。多尔衮以为弘光政权已亡，李自成又已牺牲，能与清抗衡者均已败亡，大局已定，无人再敢“梗化”，于是再颁剃发易服令，严厉推行以臣服汉族之民心，民族矛盾因而急剧上升，江南军民浴血抗清；大顺军遗部亦因剃发令由有“降清”之意转而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清高潮，故曰“彼之失人心，全在剃发易服。”清廷迅速统一全国的计划受挫，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战争，至顺治十八年才基本统一大陆，而夔东十三家抗清的最后失败则是在康熙三年。

本文对清初历史进程的论析，意在阐述其跌宕起伏的原因，当否？请方家有以教之。

附记：

本文完稿后，始见报载《李自成之死揭秘》，(120)故写此附记。

关于李自成之死，自清代就有非死于九宫山，而是归隐禅寺之说，撰稿时未采禅隐一说，是因为：

（一）自成若归隐湘北石门县夹山禅寺，大顺军余部尤其是夔东十三家长期在这一带抗清，何以未见李自成与旧属各部之间的任何蛛丝马迹，而各部也不统一，有如李自成在世之时，而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战？

（二）禅隐之说似与李自成抗争战斗的性格不相容。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屡败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与陕西巡抚孙传庭，损失惨重，《绥寇纪略》更有潼关南原大战，自成所部伤亡殆尽，仅与少数人遁去之说，于是隐息山中者二年，聚蓄力量，重振旗鼓，复出河南，从此迅速发展，终于亡明。李自成在惨败后仅余少数兵力时尚且勇于再战，何以在大顺军余部共有二十余万之众时，他却置百战之部属于不顾，离队出家？揆诸其战斗生平，实难索解。

（三）类似此说者在当时多有，不独李自成也。如于七于顺治五年（1648 年）据山东栖霞县锯齿山起义，康熙元年（1662 年）二月失败后，当时盛传他遁迹空门，在崂山华严寺（又说是下清宫）出家，终老山林。他曾将战刀埋于华严寺石阶下，临终时，发石舞刀，其徒见刀上有“于孟熹”三字，始知为于七。又一说明于七亡逃海上，清统治者惟恐于七卷土重来，每年由山东镇标拨兵百名，分防锯齿山，至乾隆年间始裁，防戍约百年。然终无于七活在人世之确据。

近年来关于李自成禅隐石门县夹山寺奉天玉大和尚即李自成之说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多篇。日前在石门召开的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认为，禅隐说可以认定。

①《清太宗实录》卷 65，第 10—11 页。
②《天聪朝臣工奏议》，第 10 页。
③同①，卷 44，第 6 页。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⑤《清世祖实录》卷 4，第 5—6 页。
⑥钱仪吉：《碑传集》卷 4。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⑦⑬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3726 页、3729 页。
⑧⑩⑪⑫《清世祖实录》卷 4，第 11—12 页、14 页、16 页、17 页。
⑨若名：《吴三桂纪略》。
⑭夏允彝：《幸存录》上。
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3，补遗。
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
⑰张岱：《石匮书后集·烈皇帝本纪》。
⑱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3，补遗。
⑲康熙十一年《束鹿县志》卷 7，《冯中丞传》。
⑳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3735 页。
㉒同上，第 3739 页。
㉓㉔㉖《清世祖实录》卷 5，第 3 页、2 页。
㉕㉙同⑳，第 3734 页。
㉗同⑳，第 3730 页。
㉘蒋良骐《东华录》卷 4，第 66 页。
㉚㉜㉟《清世祖实录》卷 5，第 10 页、3 页、4 页。
㉛㉞《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蒋良骐：《东华录》，第 66 页。
㉜彭孙贻：《流寇志》卷 13。
㊱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405—420 页。
㊲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 30，《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
㊳《清史列传》卷 79，《谢陞传》。
㊴《明清史料》丙编，第 406 页。
㊵同㊴，《李鲁生传》。
㊶㊽《清世祖实录》卷 5，第 26 页、19 页。
㊷㊸同上，卷 6，第 7 页、4 页。
㊹同㊶，卷 9，第 4 页。
㊺《请遣北使疏》。《史可法集》第 27 页。
㊻㊼《明清史料》丙编 第一本，第 94 页。
㊾彭孙贻：《流寇志》卷 13。
㊿55 57陈洪范：《北使纪略》。
51 53蒋良骐：《东华录》，第 69 页。
52《清世祖实录》卷 6，第 7 页。
54温睿临：《南疆逸史》卷 2。
56 58 78钱轵：《甲申传信录》卷 10，《使臣碧血》。
59《清世祖实录》卷 10，第 12 页。
60陈洪范：《北使纪略》。

⑥①《豫变纪略》卷 6。
⑥②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 1，《地理・兵寇》。
⑥③《清史列传》卷 79，《南一魁传》。
⑥④同⑥③，《董学礼传》。
⑥⑤⑥⑧《明清史料》甲编，第 2 本，第 104 页。
⑥⑥同⑥③，《鲁国男传》。
⑥⑦同⑥③，《白广恩传》。
⑥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288 页。
⑦⓪《清世祖实录》卷 14，第 7、8 页。
⑦①⑦②同上，卷 18，第 4 页、5 页。.
⑦③古济东：《圣教入川记》第 51—52 页。顾山贞《滇客述・川贵寇乱》。
⑦④⑦⑦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3825 页、3871 页。
⑦⑤同⑦⑦，卷 29，第 8—9 页。
⑦⑥同⑦③，第 54 页。
⑧⓪⑧③《清世祖实录》卷 15，第 12 页。
⑧①⑧⑤明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卷 4。
⑧②罗振常辑：《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
⑧④同⑧②，第 172 页。
⑧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4，十六日丁酉。
⑧⑦卫匡国：《鞑靼战纪》。《清代西人闻见录》第 34 页。
⑧⑧阙名：《江南闻见录》。
⑧⑨同⑧⑥，二十六日丁未。
⑨⓪同⑧⑥，二十二日癸卯。
⑨①同⑧⑥，《顾咸正答洪承畴》。
⑨②同⑧⓪，卷 17，第 7—8 页。
⑨③《多尔衮摄政王日记》第 9 页。
⑨④《（保定）巡抚郝晋为党国宾抗旨不剃头事揭帖》。《历史档案》1982 年第 1 期，第 7 页。
⑨⑤⑨⑥⑨⑦南国啸客：《平吴事略》。
⑨⑧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4。
⑨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3942。
(100)杜文凯编：《清代西人闻见录》，第 36 页。
(101)《多尔衮摄政王日记》。
(102)同治《浏阳县志》卷 22。
(103)《田见秀“投清”书》。《清代农民战争史料选编》，第 1 册，上第 39 页。
(104)《郝摇旗“投清”书》。同(103)，第 40 页。
(105)《吴汝义“投清”书》。同(103)，第 40 页。
(106)《佟养和揭贴》，同(103)，第 40 页。
(107)(110)《清代农民战争史料选编》第 1 册，第 51 页。
(108)史松、林铁钧编：《清史编年》第 1 卷，第 94—95 页。
(109)同(107)，第 49 页。
(111)同(107)，第 40 页。
(112)(113)同(107)，第 70 页。
(114)同(107)，第 53 页。

(115)(107)同(107)，第 48 页。

(116)(117)刘彬：《晋王李定国传》。郭影秋：《李定国纪年·附录》。

(11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 14，《李定国列传》。

(119)昭梿：《啸亭杂录》卷 8。

(120)1994 年 3 月 29 日《北京晚报》摘要转载《羊城晚报》熊育群《李自成之死揭秘》一文如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到底是怎么死的？不久前在湖南省石门县召开的李自成学术研讨会上，这个史学界的“疙瘩”终于被解开了。

1980 年，湖南省石门县在维修夹山寺大雄宝殿及挖掘夹山奉天玉和尚之墓时，发现了李自成所写的梅花百咏诗木刻残版及与李自成家乡米脂县葬俗相同的葬物。不久又挖掘出一个地下宫殿，出土的文物有许多皇帝所用的物品。这，都为李自成即奉天玉和尚归隐并圆寂于夹山寺提供了物证。

那么，为什么《中国史稿》会写李自成被打死于九宫山呢？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刘重日教授介绍了《中国史稿》编写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当时，刘教授是郭老写作班子中的一员，被分配写明史部分。写到李自成之死时，郭老特别叮咛刘重日：李自成的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靠将来研究发展再作结论。刘教授强调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允许把一个农民起义英雄写成一个和尚，只好写他被当地地主武装打死。刘教授还指出，郭老从未否定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寺一说。今天，在大量的事实及多方面的考证面前，与会专家基本认定“李自成禅隐夹山”这一结论。